

東西學術思想的會通

——林著「對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之商榷」文書後

謝扶雅

一、由處世治學的態度說起

從本刊二月號（七卷八期）得讀林繼平先生大作「對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之商榷」一文，深有感於在目前世界，東西學術思想會通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從前一般人都覺得東方自東方，西方自西方，隔膜甚深，無從互相了解。記得有一位叫做奈夫洛（Nathrope）的，曾撰了「東西相會」（The Meeting of East & West）一書，自後世人漸知東西學術思想有會通的可能性。然因各民族性格心理之不同，語文之扞格，彼此思想的領悟與會通，談何容易。過去西方寫「哲學概論」和「哲學史」等書，從不曾將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放進去。二十年代到過中國遊歷的英哲羅素，感於中國諸子百家學說之豐富與深奧，才把他所寫作的西洋哲學，加限制地標明為「西洋哲學史」。然筆者最近尚在美國見過一本大學教科書，題名「Perspectives in Philoso-

phy」，其中只有西洋各種哲學學派，而竟沒有隻字的中印哲學提及。還有一部題為「History of Art」的巨著（by H.W. Jamon），煌煌五百五十三頁圖文並茂之中，竟只以六頁用「後跋」為名，寫了「東西會通」一篇短文，插入了中國和印度的幾幅圖畫！我常訝異何以二十世紀——太空時代——七十年代的學人，心胸仍如是其窄，學識仍如是其陋！見過了現代學術界那麼多的可憐現象，我們對李約瑟能耗費幾十年的心血，寫出七、八部中國科學及文明史來，實不能不表示贊佩與欣賞了。

當然，中國學術浩瀚，古代文字艱澀，由外國人來閱讀中國古書，且欲從其中領會正確的思想系統，確實太難為他們了。像李約瑟推論「佛學破壞科學，儒學阻礙科學，道教則有助於科學之發達」這些半外行人的話，我們與其加以責備，無寧應表示體諒與同情。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總該先怪我們自己，近百

年來，只略略輸入了一極小部分的西方學術，而不會把自己的祖傳「家學」介紹給西方，讓他們真正了解中土神州的好貨色。這一點，我在本刊去年六月號（六卷十二期）「四書道貫書後的書後」文中已慨乎言之。四書五經自百餘年前，英宣教士理雅各一度英譯以來，竟未有再出版修正本。為什麼西方人譯希伯來文舊約，希臘文新約，一次又一次，而英美聖經公會還伙助中國專家漢譯及改譯聖經，也一次又一次？食果之甘，與人分享，原是人的真性與常情。西方人熱心傳道到中國，我們中國人不亦有中國經典可傳給，應傳給西方嗎，並應改譯新譯給他們看得明白嗎？我國當局倘能禮聘幾位深刻了解國學如林繼平君等，會同正確選譯經子菁華為西文，豈止今日李約瑟不致講有關係、道、佛三家思想的外行話，其影響力所及，可能整個世界文化為之改造而改觀。而目下國際間甚囂塵上的所謂「中國問題」，或中共造禍大陸問題之得正確處理，不致被

誤解與胡猜，猶其餘事。

二、條條大路通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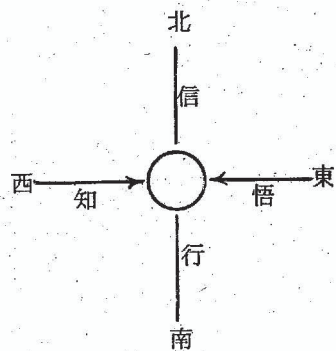
人類通性，具有惡的傾向，但也同時有善的傾向。善的傾向是指朝向「好」的方面走去，即是所謂「理想」。人們總會有些理想，而且又希望能達到最高理想的目的，雖則他們所取的途徑多不相同。這個最高理想的內容，不外乎至善，至美，和諧，幸福的一類概念；總括起來說是圓滿或完全。中國人很早生存於家族社會，成為倫理的民族，故其最高理想，主要「在止於至善」（參考「大學」篇）。西方人有一個拉丁專詞，*Summun bonum*，意思是最大幸福。當然中國通常也稱「福、祿、壽」。柏拉圖哲學中的最高理想是「highest good」。希伯來文化（包括基督教）中的人生目的是永生（靈魂不死）。佛教的最高理想是淨土，梵天極樂世界，通俗也叫做天堂。儒家比較溫和一點，能達到「大同」，「天下一家」也就滿足了。故除原始猿猴族類，渾噩無知而外，一有文明，便有理想，而有深思的人，必以通往最高理想為務，羣向此最高目的而趨。所以最高理想是共同的，統一的。反之，途徑或方法却是各殊的。不過，儘管途徑或路子不同，還是條條通到「羅馬」的。

羅馬帝國成大一統，它允許不同的萬國來賓，所謂百川歸宗，萬流羣仰。由於統一之故，因亦以最高真理自居。最高真理和最高理想，同是唯一無二的。就價值論言之，稱作最高理想，就

本體論言之，即是最高真理。宗教信仰虔篤的民族，每喜言最高真理，尊呼之為耶和華，神，梵天或真如。中國民族的宗教意識較為淡薄，而倫理想濃厚，他們的「天」只是浩浩無際的漫稱，「上帝」是至高無上的道德令名。孔子將「天」與聖王堯帝同一起來，說「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吾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孔子編定的尚書，第一篇便是「堯典」；它劈頭描敘「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所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是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中國本色的正常中國人，並不追求他個人的靈魂不死，永生，進入天堂，與真神同住。不過，大同也好，天堂也好，梵，涅槃，上帝，天父都好，種種名稱，無非代表全人類所共嚮往的最高目的，而這便是羅馬大帝國的京城。

三、四大探究方式

條條大路通到羅馬天京。大一統的羅馬權威，號召萬國萬族都來朝貢。趨達這個天京的路子，是很多的。為刪繁就簡，討論方便起見，我們姑作譬喻說天京有四大城門。從東大路東鄉來的進東門，從西鄉西大路來，進西門，南鄉北鄉各進南門北門。這四條大路代表全人類探究最高真理或趨達最高理想的四大方式。林繼平氏在其文中引錢穆氏的話：「中西覓理方式不同，中國人向內覓理，西方人則是向外覓。」這與香港牟宗三氏曾區別中國為主體性文化，西方為客體性文化



○代表圓滿、完全。

南北東西代表行、信、悟、知四條大路。

的說法（見十年前香港人生雜誌上文）相符。但我這裡無寧就世界具有四大文化系統——希臘系，希伯來系，印度系，中國系，而分別冠以四個字碼。希臘思想是由「知」的路線去探究最高真理，希伯來思想是由「信」的路線去直指最高真理，印度思想是由「悟」（冥思，神契，或直覺）的路線，我們中國則是由「行」的路線，分別邁步趨往目的地。

讓我們先從中國思想說起。孔子明言：「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中國的「學」字，不易為別國人理解，因為它不像古希臘學術思想的純知，却無寧置重實踐的行為，多少接近美國教育學說中的 *learning by doing*。論語首篇（學而）載「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孔門的課程，與其教門人誦誦研習，無寧促其踐履篤行。孔子教「

「詩」，必定要伴以聲樂或兼舞蹈，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乃其餘事而已。孔子所倡導的「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活動，決不只是一種學說或理論。同樣，孟子的「義」，是要顯出在做人或作一大丈夫上。他必須將孔子的仁實施在仁政上才行。所以中西互譯極為困難。西文的 benevolence 與 righteousness 只是一個概念，全無活動在其中。不過雙方思想的區別，只在途徑上，卻不在於目的。我從「行」的途徑走去，你從「知」的途徑走來，我們大家終竟相遇於一處，而且「莫逆於心」。中與印，與希伯來，亦然。印度與西方亦然。東西學術思想會通的可能性在此。

舉一個東西兩端的不同途徑可以會通於同一中心之例：好比古代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純粹的「知」的真理方式），他是一位醫學出身的科學家，其哲學體系有似近代的進化論。然他形上學中的上帝觀，乃是所謂「Thinking on thinking」。理性動物的人，莫不有「思」，其思必有對象，思此思彼，但上帝獨「思於思」，而靜寂自足。這與大乘佛教中之「定」(samadhi) 名異而質同。然佛教所採的方式是神秘的直覺，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Organon)，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又如南北兩極路線終相會遇之例：子思，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篇第二十章)。所謂「誠之」，是指拳拳矻矻，困學篤行，自強不息的方法工夫。反之，使徒約翰描寫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絕息時大

呼「成了」「成了」(約翰福音十九章十八及二十節)。這個出死入生而達成永生復活的天闕，與那「誠之」的「下學」而「上達」於「誠」的天道，目的地相同，路線却是南轅北轍。基督教是有名的「反說法」(paradox)——「想得生命，必喪失其生命，而喪失其生，必得永生」(新約共同福音均載)。儒家則始終矻矻地「行」它的直道，周道。

林繼平氏責李約瑟為唯物科學主義。其實，西方在古代希臘思想中，科學與哲學不分，而知識亦不限於唯物。原始希臘哲學學說中，宇宙的本質是水，或火，都是有生命性而非純物質的。赫拉克利圖(Heracitus)的「洛哥斯」(logos)。後來且給猶太哲學家斐羅(Philo)用作宇宙的靈魂；而使徒約翰更借來作聖子基督的別號(約翰福音一章一至三節)。再以後，在中國的聖經漢譯家，老實翻譯「洛哥斯」作「道」。四十年前，我在嶺南學報上發表「道與洛哥斯」一文(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有該學報全套)，嚴謹地分析「道」和「洛哥斯」的大分歧。迨數年前，我在香港的崇基學報上刊登「太初有道」，却轉而欣賞這個譯名的至當。中國老莊及儒學中的「道」，皆與希臘思想的「洛哥斯」，真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但就目的或本體而言，兩者可以出會於一點。讓我再補說希臘亞里士多德哲學與佛教大乘之出會於一。前者主張寶塔式的宇宙觀，稱塔的頂尖為 Pure form(純粹法式)。這寶塔全部由「法式」與「質料」

(matter) 層層套合而成。宇宙間無物不包含此兩因素，獨有超絕的上帝是「純粹法式」，但這只是一個空洞的理念，毫無具體內容。梵文的「空」，固不能英譯為 empty 或 void，時人巧譯為 nothingness 已算不錯。但循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這「空」不妨逕譯之為 God-in-Himself (上帝在其本身)。隨而佛教的「如來」，便可英譯為 God-for-Himself (上帝為其本身)。然而印度與西方彼此探究真理的路子，却是截然不同的。

四、混合，分化，與統一

希伯來思想所取的途徑是堅決的信心。耶穌屢屢強調信便得救，不信必告死亡。但基督教一入希臘文化世界，那裡的西方人，跟猶太民族的性格大異。他們不甘於信上帝便是信上帝，却必欲以「知」證「信」，乃造作了種種色色的「上帝存在」之證明——本體論的，宇宙論的，目的論的。而這是兩希相激相盪的神學。神學五光十色，學派繽紛。在中世紀即有所謂「經院哲學」，它以聖多馬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學總論巨構為達最高潮。聖多馬採合了亞里士多德哲學與基督教信條於一爐。到了近代，大哲康德將以前一切上帝存在的證明，駁斥無遺，而另想出一個道德學的證明，從「意志自由」的道德律推論至「上帝存在」，「靈魂不死」。康德所採取的途徑不妨說是七分「知」與三分「行」的折衷混合路線。然康德的道德學說是「自律

論」，與中國道德學說的「自得論」似同而却不同。「無入而不自得也」的儒家修養工夫，自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起，迤邐兩千年，直至王陽明的「真灑落」人生，都走這條大道。不過陽明更受了禪宗的深重影響，除中國傳統的「行」而外，揉合了印度的「悟」，成為道德學說中的「直覺論」。所以他的「良知」一詞被西譯為「intuitive knowledge」；但我們切勿誤認此「知」為西方式的，希臘思想中的純粹知識。

李約瑟說朱子有些科學思想：這就是就晦庵對「大學」書中「格物致知」補釋了「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幾句話而言。然朱子的「即物窮理」工夫，主要為讀書靜坐，與西方科學家的觀察，蒐集，分類，歸納，試驗絕不相同。故朱子的「致知」，無寧得力於北禪的「慧」(Panya)學。這樣，朱子假借了印度頓悟路線中某些成分來體驗中國傳統的「行」，頗與西方中世紀聖多馬(見上)用了希臘亞里士多德的「知」去證明基督教正統的「信」相稱。所以筆者嘗稱朱晦翁為中國的聖多馬。王陽明曾對他窗前的竹「格」了三年，結果毫無所得，倒反格出病來。這毛病是出在他沒有顯微鏡，解剖刀，試驗管那一套科技工具。於是他轉將「格物致知」藉南禪的「定」(見上)以深刻化孟子的「良知」，而造成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說。這是他與朱子的分歧點，亦即是陸王心學跟程朱理學的分野。但朱子的理氣路線既可與聖多馬的神學路線相會通於「天理」或理性的神，則陽明的直覺路線亦未嘗不可與現代西方的實存主義的上帝觀相會通。陽明四句教中「無善無惡之心之體」，誠然由佛教的「空」而來，但何嘗不即等於西方的God-in-Himself。上帝在其本身是不可道不可名的上道(老子第一章)，是

「無」(參老子的「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無極而太極」(宋周濂溪語)，是「太一」(莊子天下篇中指老子的本體)。而「上帝為其本身」(God-for-Himself)則是造化萬千，恒河沙數的雜多。

從「一中有多」「多中有一」(One in many, many in one)的一多互攝說，可知路雖百千萬條，而「道通為一」，千門萬戶，皆為巡禮者而開。韓非子顯學篇稱「自孔氏之死也，儒分為八」。不錯，單說洙泗學院裡那主修文學科的子游子夏(見論語先進篇)，前者有志於「大同」夢想的黃金時代(參禮記禮運篇)，後者謹持詩禮，踏實立身。子夏學派與曾子學派的流行演變，分別傳到兩漢的訓詁經學與識緯經學；分道揚鑣，如是其烈！孟子發揮了子思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雖「距楊墨」而復吸取其長，乃製成了他獨特的思想體系。荀子反對思孟，但宗孔子，別開了孔學的生面，然他絕未行走西方「知」的門路，正如孟子亦決不踏上印度或希伯來的宗教門路一樣。馮友蘭謂孟子有似柏拉圖，荀子有似亞里士多德(見其中國哲學史上卷)。西方人每自稱其思想方式不入於柏型，即入於亞型，其未流所及，演為今日變態的實存主義與邏輯實證論。他們總是像鐘擺樣左右趨兩極端。中國儒家系統中，自孟荀以至程朱陸王，雖各分馳，而皆仍持守「從容」的「中道」；為了行路必須着地，而「知」則必須「上天入地求之偏」，必要波濤跌宕，叱咤風雲。然而孫悟空騰身十萬八千里，跟沙和尚的平實，豬八戒的欲望，都不能脫離如來的手掌。人的本心既終合乎天心，

則因受了時代環境，民族心理而造出的深潭中萬般月影，總歸仍是中天的「月」。所以東西學術思想會通雖殊不易，而可能性既然具在，則讓我們大家都來努力好嗎！

一九七四，仲春，自美紐澤西州修女庵畔

附言：東西學術會通成功之一淺例，如今日已通行之度量衡表中的「公尺」「公斤」等等。數十年前，國中有過中西醫藥的一場大爭論，互相詆毀，意氣囂張。其實中國醫書上的「金」，「木」，「水」，「火」，「土」，決非可以西譯作物質名詞。「傷寒」，「傷風」，難道可以照字直譯？藥方中「君」「臣」「佐」「使」的理論，全屬借喻象徵，應知如何給外國人說明。時至今日，中西醫藥已多能融會而諒解了。我國中世盛譯佛經，除巧譯「真如」「如來」等詞而外，對「涅槃」，「菩提」「波羅蜜多」這一類難覓同等涵義的漢字，概予譯音。但音譯等於不譯。這在那時，誠屬不得已之舉。現在人智大開，彼此不難互相領會。「銀河」早不被譯為Silver river，彼方的Milky way亦不致誤譯作「牛奶路」了。最近從台北傳記文學月刊上讀劉師舜氏評論關於四書五經的英譯兩文，我益感在譯事上一手孤掌之不行，與會同或校核的必要性。研究我國學術經文，清末已有人謂應「考證」與「義理」兼重。即如劉氏所提及的禮記大同章，仍依傳襲說是孔子之言。按孔子(元前五世紀)與禮運篇作者(元前二或三世紀)年代相距，至少亦有二百年。照學術思想分化演進的規律，子游學派應產生於深受道家影響之後，故大同的一章，我們只能泛稱謂「儒家」的理論，而不得專屬諸孔子也。孔子本人實在不會有此種思想。